

学苑文丛

中国文选学

中国文选学研究会
河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编

第六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① 钱仲书《文选》研究
② 孙立《〈文选〉研究的几个问题》
③ 孙福明《〈文选〉研究的一批新成果》
④ 李山《〈文选〉研究》
⑤ 魏明《文选学》

学苑出版社

ISBN 978-7-5077-2957-3



9 787507 729573 >

定价：100.00元

中國文選學

(第六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國文選學研究會 編
河南科技學院中文系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选学：第六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文选学研究、河南科技学院中文院中文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7.9

ISBN 978 -7 -5077 -2957 -3

I. 中… II. 中… III. 文选—文学研究—中国—国际学
术会议—文集 IV. I 206.2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369 号

责任编辑：战葆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yg@sina.com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 - 67674055、67675512、67678944

印 刷 厂：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尺寸：787 × 1092 1/16

印 张：35

字 数：700千字

版 次：2007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1100册

定 价：100.00元

編 委 會

学术顾问：曹道衡 俞绍初 许逸民

主 編：崔军红 周全星

委 員：白明利 陳麗湘 崔軍紅 範雲晶

高芳豔 侯冬梅 劉剋平 劉雲霞

尚靜宏 王鳳玲 徐豔玲 周全星

序

中國文選學研究會成立至今，將近十二個年頭了。這部論文集的出版，既可作為紀念研究會誕生的一份賀禮，又標示着文選學研究工作正在繼往開來不斷地向前推進，其意義自不同尋常。

記得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在改革開放、百業復興的大背景下，學術界的一些有識之士發出了“弘揚民族文化，振興文選學”的呼聲，很快得到了廣泛響應。經過在多次學術會議上的討論醞釀，中國文選學研究會終於應運而生。自此，文選學研究一改過去那種停滯不前的沉寂局面，開始有序運作，至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這一時期，由於廣大文選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文選學研究收穫頗豐，成績可觀。據不完全統計，在短短十餘年間發表論文約 500 餘篇，出版的專著計 20 多部。這些論著就文選學廣泛的問題，諸如《文選》文本的解讀，《文選》的成書過程和選文標準，“新選學”的內涵與展望，《文選》與《文心雕龍》等先唐文論之關係，以及李善注與五臣注的評價等等，展開了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少頗有價值的新見解與新資料，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較之以往，都取得了長足進步。

在此過程中，老一輩學者以他們扎實的功力、謹嚴的學風，有力地推動着文選學研究發展，為年輕一代作出了表率。所憾的是，他們之中如楊明照、屈守元、沈玉成、倪其心等先生已在近年間陸續與世長辭；我們的原任會長曹道衡先生也因病醫治無效，不幸於 2005 年 5 月 9 日，即第六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前夕，永遠離開了我們。對於這些先生的去世，我們深為痛惜，但他們的學術風範和在選學研究上的業績卻不會隨之而消失，將作為榜樣留在我們心間。

讓人高興的是，在文選學研究領域中涌現出了為數不少的中青年學者。他們年富力強，目光敏銳，善於弘揚舊學，吸納新知，不斷地取得新的成果，為文選學注入活力，他們已成為研究會的骨幹和中堅，這也說明文選學研究後繼有人，前景光明。

廣泛聯絡海外學者，與他們聯手推動文選學研究是中國文選學研究會的宗旨之一。過去，海外學者曾給予我們不少幫助，有的為我們提供大陸缺藏的珍貴的文獻資料，有的與我們過力協作共同完成學術項目，而他們在研究工作中體現出來的思路和方法也足能啓發思考，供人借鑒，有利於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如今海外的不少舊友新知又遠涉

重洋起來新鄉，其中特別是岡村繁先生不顧80有餘的高齡，排除種種困難，毅然率團參加會議，其高情厚誼確實令人感動。所以，第六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是海內外學者又一次共聚一堂，切磋學術、增進友誼的成功的盛會。

這次提交會議討論的論文共有53篇，其中有幾篇圍繞着《文選》的編纂問題而展開。關於這一問題過去有不少學者曾發表過看法，存在着爭議。曹道衡先生《關於〈文選〉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汲取諸說之長，融會自己的心得，指出《文選》全書的編纂應在普通三年以後，是在《詩苑英華》的基礎上刪訂而成，在昭明生前尚未最後加工完成；又認為它曾參考和借鑒過前人已有的選本，並非空無依傍。這些見解，由於是在仔細審讀現存資料的基礎上所作的合乎事理的推斷，就其總體而言比較可信，為今後繼續深入討論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

有關文選學研究史方面的問題，這次有13篇文章有所涉及，可謂收穫頗豐，其中許逸民先生的《論隋唐文選學興起的原因》很引人注目。文中指出唐初的選學導源於“《漢書》學”，又與“類書學”一脈相承，而其動因則是科舉考試。這種見解與以往有關論述相比，更見細密豐滿。周勛初先生的《李由“三擬〈文選〉”說發微》一文，則從個案入手，用來說明盛唐初詩人對於《文選》的“濡染之深”與高度重視，指出他們的創作“都是在學習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基礎上求得發展的”。受此啓發，不禁使人想起孟浩然的名篇《過故人莊》，其“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二句，近世注家多以《論語》所載子路遇荷蓀丈人的故事作解，其實，此當出自《文選》所收范雲的《贈張徐州詩》：“恨不具鷄黍，得與故人揮。”僅此一端，足見唐代的一般詩人是如何熟精《文選》而又有所創新的，這也印證了周先生論斷的正確性。至於其餘幾篇論文，分別就隋朝至當代幾位選學名家的專著或言論進行述介和評析，這對於日後系統梳理文選學史是有參考價值的。岡村繁先生是繼斯波六郎之後日本《文選》研究的代表人物，海村惟一先生的《岡村文選學發微》即對岡村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學術體系作了簡要的說明，惜在內容上似尚未展開，好在岡村先生的文集已在大陸正式出版，讀者可以兩相取照，不難全面瞭解文選學在日本的影響以及岡村先生在這方面的學術成就。

《文選》的本體是由其所收的各類文體與作家作品構成的，因此，加強對文體和作家作品的研究，無疑是文選學的一項主要任務。事實上，近年來這方面日益受到重視，論文也越來越多，我們應該歡迎這一趨向。衛紹生先生的《魏晉文體論與〈文選〉的文體分類》一文，詳細論述了魏晉文體觀念的演變和形成，認為《文選》的文體分類直接取法於此，而並非《文心雕龍》；張永鑫先生的《蕭統〈文選〉賦觀三題——兼論《文選》對賦史之貢

獻》，則從辭與賦的辨析、兩漢賦發展演變的階段以及魏晉賦兩種風格的對立等三方面，來窺測蕭統通過編纂《文選》所體現的賦觀，從而說明他對賦史作過深入的研究，是有貢獻的。以上兩篇論文，材料充實，可成一家之言。此外，有關作家作品的各篇文章，或考訂事迹，或疏通文義，或論析篇章，大多做到細緻深入，不只是對文選學，對漢魏六朝文學研究也甚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程章燦先生的《〈頭陀寺碑文〉所用佛典與〈涅槃無名論〉之真偽——讀〈文選〉札記》一文，通過對《頭陀碑文》和李善注的校勘考析，解決了在佛教史上存在的《涅槃無名論》是否偽作的一樁公案，這可說是文選學研究的額外收穫了。

在《文選》版本研究方面，經過傅剛、羅國威等先生的努力，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次提交的論文，如羅國威先生的《敦煌本斯五五五〇〈文選·晉紀總論〉校證》、常思春先生的《〈文選集注〉殘卷於〈文選〉正文校勘價值例證》、芳村弘道先生的《靜嘉堂文庫所藏古鈔無注本〈文選〉卷十殘卷校讀記》等，都用心深細，可為將來整理《文選》以及正確解讀文本提供有用的參考。

這部論文集，比較集中地反映出近期文選學研究所取得的成績，也表明文選學作為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它涉及諸多領域，具有豐富的學術資源，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們相信，只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繼承和發揚傳統的考據學與史料學方面的知識經驗，靈活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必能有所發現，有所創新，從而使文選學研究的面貌大為改觀。

俞紹初

目 錄

序	俞紹初
關於《文選》研究的幾個問題	曹道衡(1)
蕭統選陶、評陶的自相矛盾及其親編《文選》新證	胡耀震(8)
朱彝尊“《文選》初成聞有千卷”說不能成立辨 ——兼論何融《文選》“非一人所能完成”說之未為得	力 之(13)
《文選》的主要編纂者劉孝綽考論	田宇星(22)
蕭統編纂《文選》的困惑 ——從《文選》所收曹植賦說起	崔軍紅(35)
從“文學觀點”與“文體選目”看《文心雕龍》對《文選》的影響	李金坤(40)
論隋唐“《文選》學”興起之原因	許逸民(47)
蕭該生平及其《文選》研究考述	王書才(56)
李白“三擬《文選》”說發微	周勛初(62)
《文選》對日本平安時代的影響 ——以《菅家文草》《菅家後集》為例	[日]陳秋萍(78)
何焯評點《文選》述評	(中國臺灣)徐華中(89)
《文選》詩類評點術語 ——以評注本何焯評點“氣”之核心範疇為例	黃怡慈(94)
胡克家《文選考異》述評 ——清代文選學之一	(中國臺灣)游志誠(112)
李詳與《文選》學研究	穆克宏(118)
毛澤東評引《昭明文選》的啓迪	錢永波(129)
錢鐘書《文賦》研究 ——兼論《管錐編》之學術價值	陳延嘉(136)
讀解錢鐘書關於《文選·論》類之批評 ——以《運命》、《辨命》、《廣絕交》三論為中心	陳復興(150)
問村文選學發微	[日]海村惟一(170)
魏晉文體論與《文選》的文體分類	衛紹生(179)
蕭統《文選》賦觀三題 ——兼論《文選》對賦史之貢獻	張永鑫(189)
別詩說略 ——讀《文選》隨札	宋恪震(199)
從《文選》“七”看七體題材內容之演變	孫津華(208)

《文選》哀祭文類

- 誄、哀辭探索 林登順(213)
- 與神女遇者是襄王還是宋玉
——關於《文選神女賦》的异文 楊明(236)
- 讀司馬相如《封禪文》札記 侯艷(242)
- 《西都賦》中的長安城建制 吳曉峰(249)
- 試論曹丕《典論·論文》“齊氣”釋當以李善注、黃侃平點爲正解 王慶元(257)
- 談曹植《贈白馬王彪詩》的幾個問題 俞紹初(262)
- 王粲《登樓賦》、《七哀詩》、《從軍行》之接受狀況初探 王政(271)
- 超越死亡
——阮籍的死亡超越意識對《莊子》思想的繼承與變化 崔永斌(277)
- 竹林七賢評價、交往與嵇康死因真相考辨 樊榮(283)
- 情志高遠 造語清新
——張景陽詩試論 徐昕(296)
- 關於左思《三都賦》及其序注 顧農(310)
- 論《文選》補亡詩 曹辛華(319)
- 潘岳的婚姻及其相關作品獻疑 王曉東(330)
- 陸機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劉志偉(339)
- 文學模擬的傳統和陸機《擬古詩》的再評價 涂光社(349)
- 《文選·弔魏武帝文並序》今本善注補正 朱曉海(355)
- 從《文選》對遊仙詩的選錄看編選者的人生旨趣 王青(364)
- 顏延之《五君咏》與蕭統《咏山濤王戎》作意蠶測 (中國臺灣)江建俊(370)
- 試論《文選》二謝詩 張亞新(390)
- 從《蕪城之歌》看鮑照《蕪城賦》的創作時間 丁福林(401)
- 《頭陀寺碑文》所用佛典與《涅槃無名論》之真偽
——讀《文選》札記 程章燦(406)
- 敦煌本斯五五五〇《文選·晉紀總論》校證 羅國威(415)
- 《文選》李善注中的作者注與題目注 胡大雷(418)
- 關於李善注的二三個疑問點 [日]清水凱夫(437)
- 尤刻本《文選》李善注二題 王立群(444)
- 《文選集注》殘卷於《文選》正文校勘個值例證 常思春(452)
- 靜嘉堂文庫所藏古鈔無注本《文選》卷十殘卷校讀記 [日]芳村弘道(479)
- 《昭明文選》邵氏批語逐錄稿 范子燁(506)
- 精該簡要 古義湛然
——孫志祖及其文選研究 范志新(527)
- 新鄉地域文化概說 周全星 崔軍紅(535)
- 編後記 (542)

關於《文選》研究的幾個問題

曹道衡

關於《文選》的編纂時間，研究者們作了不少推測，有人認為在普通中後期（約523 - 526）；也有人認為始於天監末（519 前幾年）。筆者過去曾以為《文選》的成書當在大通後期至中大通初（528 - 529），但未涉及其着手編纂的時間。現在看來，這種設想雖未必全誤（因為《文選》所錄作品，其作者均已逝世，而陸倕之死，在普通七年），但全書的編纂，主要應在普通年間，而大通以後，由於丁貴嬪墓地的“蠟鵝事件”，蕭統的處境和心情已大不如前，恐怕難於從事這種工作，最多不過做一些收尾的事而已。現在我們讀《文選》往往會感到它頗似一部未完工的選本，當與此有關（這一點下文詳談）。至於這一工作始於天監末的說法，主此說者甚少，其說亦殊難苟同。因為據《梁書·昭明太子傳》：“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典故語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檢《隋書·經籍誌》，除“《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外，有“《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又謂梁“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文章英華》之名僅見著錄於此，說明《文章英華》僅存於梁代，入隋已亡。關於此書與《古今詩苑英華》是否一書之不同稿本，已無從考知，但照《梁書·昭明太子傳》的說法，它也是一部詩歌總集，而照《經籍誌》的記載看來，卷數又與《昭明太子傳》不同。這個問題，只能姑置勿論。至於《古今詩苑英華》一書，則不但隋時尚存，《舊唐書·經籍誌》和《新唐書·藝文志》皆有著錄。蕭統所作《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所說“《詩苑英華》”，當即是書。從蕭統那封信看來，此書的成書年代當不晚於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因為蕭統這封信是答覆蕭繹向他求文集和《詩苑英華》的信而發。蕭統的文集（劉孝綽所編之本）成書於普通三年，因為此書的劉孝綽序稱：“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語。按：梁朝建立到普通三年，正好是二十一年，而這一年，大約也正是蕭繹從會稽太守調回建康作丹陽尹的年份。因為據俞紹初先生《昭明太子蕭統年譜》（附見《昭明太子集校注》），蕭繹的調任丹陽尹，正在這一年。按：蕭繹從會稽調回建康，史書雖無明文，但俞先生據《續高僧傳·釋智藏傳》載智藏於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湘東王繹為制碑銘，推測蕭繹是年已回建康。此說當是。因據《梁書·武帝紀》下，普通五年六月，“以會稽太守武陵王紀為東揚州刺史”，則此前會稽太守已為蕭紀而非蕭繹，則蕭繹之離會稽到建康時間為普通三年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說蕭統文集成書於普通三年，那麼《詩苑英

華》當更早些，因為蕭統在信中說：“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這說明此書成書在普通初甚至天監末，其時間當與《詩品》的出現相差不多。因為據《梁書·文學·鍾嶸傳》，鍾嶸完成《詩品》後，“頃之，卒官”。其時間在晉安王（即簡文帝蕭綱）為西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之後。按《梁書·簡文帝紀》，蕭綱為西中郎將事在天監十七年（518）。現在看《詩品》一書，所論作家，皆卒於天監十二年（513）以前。以此推測，則《詩苑英華》所錄作家大約也多卒於天監末以前，和《文選》的面目當有較大差別。不過，《文選》的編纂很可能以此書為基礎，刪改面成。因為此書之成，顯然在《文選》之前，而同一編者所選的兩個選本，總會以前者為後者之依據。這一點，我前幾年在《文選與辭賦》一文中，曾猜想《文選》的編纂，曾以《正序》、《詩苑英華》及梁武帝的《歷代賦》為依據。現在讀俞先生的《昭明太子蕭統年譜》，認為“自長編而至於三十卷《文選》，其間尚有一中間環節，即《正序》、《英華》二選本”，深覺頗有同感。如果俞先生和我的想法不錯的話，那麼蕭統對《詩苑英華》的看法，對理解《文選》的情況就更具重要參考意義。

二

如果說《詩苑英華》之成書在《文選》之前，而《文選》的編纂又曾以《詩苑英華》為依據，那麼《文選》的編纂始於天監之說自難成立。其實這種說法的主要根據僅僅是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十所談到的唐人竇常的一段話。原文云：

竇常謂（蕭）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然則所錄皆前人作也。

這段話究竟是竇常的原話，還是出於晁公武的發揮已很難確知。即使說是原話，亦難以證明《文選》編於何遜健在之時。因為一部選本有沒有收錄某位時代相近的作家之作，可能有種種不同的原因，如選者對作者風格是否喜愛？或者那位作者的名聲是否為選者所熟知？甚至還有一些非文學的因素（如梁武帝對何遜有些惡感）等，未必因為何遜沒有作品入選，就可以證明《文選》一定編於何遜生前。其次，《文選》中對卒於天監末普通初的作家未予收人的遠不止何遜一人。如柳惲、吳均卒年皆與何遜相仿，亦未加收錄。這種情況恐怕未必是由於這些人尚在，因為《文選》中明明收入了劉峻（卒於普通二年 521）、徐悱（卒於普通五年 524）和陸倕（卒於普通七年 526）的六篇作品，而這三位作者的卒年均較柳惲（卒於天監十六年 517）何遜（約卒於天監十八年 519）和吳均（卒於普通元年 520）為遲。可見何遜諸人之作所以未能入選，當另有其原因，並非由於其人尚在。

關於何遜等人的作品未被收入《文選》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由於他們的詩風比較傾向於婉麗，和蕭統本人之崇尚典雅不同。在過去的學者中，駱鴻凱先生似乎就有這種看法，他在《文選學》一書中論到《文選》之“崇雅黜靡”時，就舉出了《文選》中摒棄

柳惲、吳均等人的作品爲例（見第 32 頁）。這種看法顯然有一定的道理，因爲《文選》中所錄作品確以風格比較典雅者居多，而近於綺靡者類多擯落。不過，像柳、何、吳等人之作，雖較之齊及梁初之沈約、謝朓更近新體，但他們較之同時一些作家，畢竟還是不同的。宋黃伯思在《東觀餘論》中評何遜一些詩“句殊雄古”；明張紘《何水部集跋》亦謂何詩“蓋出雄渾於婉麗，仲言猶爲近古也”。吳均的詩《梁書·文學》本傳已謂其“文體清拔有古氣”；柳惲之作，亦頗渾厚有古氣，像《搗衣詩》中“亭皋木葉下，隴首秋云飞”；《從武帝登景陽樓》中的“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等筆力亦頗道勁。前人論柳惲，或謂其“格居何上”，雖未必是定論，要亦是相頡頏。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論吳均、何遜諸人時，稱他們爲“重自然、重真情的作家”，“都受着漢魏古詩的明顯影響”（第 384 頁）。像這樣的詩風，恐怕蕭統也未必會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現在我們讀《文選》，往往覺得對天監十二年沈約逝世以後的作家僅錄徐悱的《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未免有失公允，蓋徐詩雖亦可讀，然少創新，較爲何、柳諸人名篇，當有遜色。但這一情況是否蕭統的取舍失當，似尚可研究。從《文選》收錄的作品看來，雖以典雅之作爲多，但也兼取不少“清辭秀句”，這一點連駱鴻凱先生也早已談到。何、柳諸人的詩，雖未必可入“高文典冊”之列，但一些名篇仍不失爲“清辭秀句”。因此若僅僅以“崇雅黜靡”來解釋何、柳諸人沒有人選的原因，恐怕未必全而。根據筆者本人的猜想，這可能和《文選》是一部並未最終完成的選本有關。說到《文選》一書是未完工之作，也許有不少人會覺得難以同意。的確，此書確如黃季剛先生所說：“采擇殊精，都爲名作”（見《量守廬講學二記》，《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 年第一期），但在編排的次序及方式方面，却存在有不少缺點。例如研究者們經常提到的關於若干魏及西晉作家的排列順序，在不少卷中往往各不相同。有的研究者認爲《文選》所收作品皆錄自蕭統以前的各種選本，因爲諸書體例不一，遂發生矛盾，蕭統的責任在於他沒有仔細地通閱一過，加以統一。這種解釋是否正確，姑置勿論，但全書的體例未經認真統一却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和這種情況類似的就是對有些原有序文的作品，處理方法也不一致。應該指出：《文選》中所錄作品有的有序，有的無序；其取舍有時並不妥當。例如第三十卷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附有序文。這篇序雖係擬托曹丕口吻，但確出謝靈運手筆，因此收錄序文對瞭解作品，顯然有益。但令人不解的是在第三十一卷中收錄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時，却又刪去了原有的序文。其實謝、江二序，對理解作品都有幫助，本當同等處理，却存謝去江，未免體例不一。在收錄序文的問題上，選有一種現象，似亦難以理解，那就是所附序文，並非作者本人手筆，而出於後人所濫入。如卷十六司馬相如《長門賦》，也有序文。這篇序開首就稱“孝武皇帝陳皇后”，其實司馬相如之死，遠早於漢武帝，他怎能以漢武帝的謚號稱之。檢《史記·外戚世家》、《漢書·外戚傳》，陳皇后無“復得親幸”之事。此序顯然出於一位對漢代歷史茫然無知者之手。目前多數學者也大多認爲序文是僞，《長門賦》本文爲真。《文選》取《長門賦序》而不取《雜體詩序》，未免去取失當。此外，有些作品錄自《漢書》等史籍，有時把史書的記事之文刪取收入，如卷四十三的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一文，前面“歆親近”至“責讓之曰”五十九字，乃《漢書》文字，非出劉歆

手筆，收入《文選》，似亦欠妥。像這些例子，說明《文選》的採擇雖甚精審，而體例编排的方面，似尚多缺陷，兩者頗不相稱，更證明此書是尚未最後加工定稿之書。

從蕭統的生平經歷來看，《文選》一書之未能最終完成是完全可能的。因為根據《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看來，截至普通三年秋冬之交，《文選》的編纂工作似乎尚未開始，所以蕭統在信中並無一字提到《文選》。從普通三年秋冬間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丁貴嬪之死，僅僅四年有餘。在這期間要對上下數千年間的詩賦和駢散文進行精細的選擇，本來是要花不少工夫的。儘管蕭統當時的工作，有《詩苑英華》、《正序》作為基礎，又有前人的一些選本作為參考和借鑒，但仍然是一個非常繁重的工作。這一工作究竟是蕭統一人之力還是曾得到劉孝綽或其他人幫助，論者說法不一。不過，這種選本的編纂在一般情況下，增加一些人力雖能因集思廣益而對質量有所提高，但在某些問題上的討論和爭議有時還可能花去較多的時間。再說《文選》的編纂雖可判定在普通三年以後，但具體開始時間已無法確考。所以截至普通七年十一月，《文選》的編纂工作尚未完成是完全可能的。至於普通七年十一月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丁貴嬪病重期間，“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丁貴嬪死後，蕭統按照當時的禮制，父在應為母服喪一年，那麼普通七年的次年即大通元年（527）十一月以前，蕭統正在服喪期間，自然不可能進行《文選》的編纂工作。從大通元年十一月到中大通三年三月蕭統生病至四月去世，中間有三年多時間。在這個期間，蕭統有沒有進行《文選》的編纂工作呢？筆者過去認為他在當時曾從事過該工作。現在看來，此說雖不全誤，但多少忽視了蕭統處境與普通七年以前的不同。應該承認，在大通元年底以後，蕭統確曾對《文選》進行過增訂，例如陸倕之文，很可能是在此期間收入的。但應該注意的是：丁貴嬪死後，蕭統服喪盡禮，“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這時他身體已很虛弱，“每人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見《梁書》本傳）。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體力本已受損。但接着又發生了所謂的“蠟鵝事件”。此事《梁書》不載而僅見於《南史·梁武帝諸子傳》。據說，丁貴嬪死後，蕭統曾派人為她物色葬地。有一個人願意賣地，索價三百萬，蕭統許以百萬。這時另一位賣主通過一個宦官密奏梁武帝，說蕭統所買之地，不如自己出售那塊對梁武帝吉利。梁武帝就命令改買這一境地。下葬以後，却有個道士，說這境葬地“不利長子”。於是蕭統就在地裏埋下蠟鵝等物，作為禳解。這時又有人向梁武帝告密，說是“太子厭禱”，梁武帝大怒，窮追其事，使蕭統受到很大打擊，從此憂鬱多病，終於在中大通三年四月死去。關於“蠟鵝事件”的發生時間，《南史》並無明文記載，但大致亦可以推測得知。根據《左傳·隱公元年》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似乎地位越低，下葬越早。這種制度在後來，似乎不大被遵守。以晉代為例，武帝在太熙元年（290）四月死，同年五月（已改元“永熙”）下葬，中間僅一個月。東晉元帝以永昌元年閏月（當為323年初）死，於明帝太寧元年（323）二月下葬。凡兩個月，時間都很短。丁貴嬪的地位顯然還比不上帝王和皇后，其下葬時間自不會太久，從丁貴嬪下葬到“蠟鵝事件”出現，其間隔也不會很久，大抵都當在大通元年年內。“蠟鵝事件”發生後，“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故其嗣不立”（《南史·梁武帝諸子傳》），可見梁武帝對蕭統的態度，也

發生了很大改變。這件事，雖由於徐勉的固諫而表面上得以平息，但不論在梁武帝還是蕭統心中，都形成了一個不可消除的癥結。因此很難設想蕭統還能像過去一樣全力投入《文選》的編纂，他充其量只能對過去業已完成的部分作一些訂補和收尾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對某些時代某種文體的選錄工作尚未做到完善而又無力修補的情形是很可能發生的。在這裏，對梁代天監後期至普通年間去世詩人之作的選錄也許正是《文選》的一個薄弱環節。因為《文選》選錄詩歌，顯以《詩苑英華》為初稿，但《詩苑英華》一書，蕭統本人並不滿意。所以他說：“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在這裏“上下數十年間”一語，存在爭論。俞紹初先生認為“十”乃“千”字之誤，因為在蕭統的《答晉安王書》一文中，有“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句，故疑這裏亦當作“數千年”。不過，從《詩苑英華》的具體情況來說，作“數十年”也未嘗不可通。因為在當時印刷術尚未發明，書籍的傳鈔全靠手抄的條件下，要搜集到當代或時間較近的作家的集子很不容易。尤其是社會地位較低的一些文人，其集子的流傳更為不易。以何遜為例，他卒於天監末或普通初，他的集子是王僧孺編的。王僧孺卒於普還二年或三年，則何集成書，至早也是普通元年或二年，此時蕭統的《詩苑英華》可能已編成，自然難以採擇此書。吳均卒於普通元年，其集子的成書當更晚，更難得到採擇。現在我們看《文選》中所錄天監十二年以後逝世的作家，其實只有三人：劉峻、徐悱和陸倕，所錄作品凡六首。在這三位作家中，陸倕曾任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和中庶子諸職，與蕭統關係最密。徐悱乃徐勉之子，死時蕭統曾派人弔唁，他又是劉孝綽的妹夫，蕭統自不難看到他的作品。在三人中，劉峻較徐、陸似較疏遠，但據《文選》劉峻《廣絕交論》李善注云：“劉孝綽與諸弟書曰：任昉既假到洽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口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贖，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又《梁書·劉孝綽傳》云：“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治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按：劉孝綽與到洽交惡之事，發生在普還後期，當時劉孝綽用以攻擊到洽的文章中，顯然包括劉峻的《廣絕交論》，可見當時蕭統對劉峻之文，已早有印象。再加上劉峻晚年，雖官位不高，而名望甚大。《梁書·文學》本傳稱：“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因此他的文集較早為蕭統所搜集到，也是很可能的。

現在看來，《文選》所錄天監以後逝世的作家之作，在駢文方面獨取劉峻、陸倕的五篇，應該說是非常確當的，但在詩的方面，僅取徐悱一首而遺落何、柳諸人之作，則不免令人遺憾。鑒於《文選》頗似一部未最後完工之書，那麼也許蕭統還沒有來得及對這部分作品進行修訂、補充，而疾病和死亡使他不可能把這個工作做到最後完善的地步。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確實不可能有人去把《文選》修訂得更完善。因為《文選》的編者是由蕭統署名的。作為一位太子，在蕭統去世之後，即使在此前有合作者，到此亦再不敢置一詞，這是封建社會中人所共知的通例。

三

和上述那些問題有較密切關係的，還有一個《文選》的收錄作品，多取自前人已有

選本的問題。此說是近年來國內外一些學者提出的。他們的主論顯然確切有據，應該說是正確的。不過，像《文選》那樣包舉先秦至梁上下千餘年的選本，對各代作品的選錄情況往往很不相同。大體上說，從先秦至西晉末這個階段，時間跨度很長，但其難度可能較小。因為越是古代的作品，由於流傳時間較久，人們對它們都已有了一些比較一致的定評。再加上在蕭統以前已經出現了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東晉李充的《翰林論》這樣的選本。摯虞生活在西晉末，其所錄作品大約可以下及三國甚至西晉初；《翰林論》成書於東晉中葉（據《世說新語·言語》，李充與殷浩同時），他所選錄的作品，不但包括西晉，可能也涉及東晉初（《詩品》載，《翰林論》中曾稱贊過郭璞）。現在看來，《文章流別集》和《翰林論》對《文心雕龍》和《詩品》都有較明顯影響，對蕭統和《文選》當亦如此。所以蕭統在選錄西晉以前的作品時，應該費力較少。稍後的東晉和劉宋二代，情況就與此不同，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著錄，在摯虞、李充之後，蕭統之前還出現過宋臨川王劉義慶的《集林》和南齊孔道的《文苑》二書。劉義慶卒於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集林》成書當早於此年。劉義慶本人雖無多大文學才能，但他幕下確有許多著名文人如陸展、何長瑜、鮑照等。此書今雖散佚，但估計應該是一部較有眼光的選本。不過，此書對《文選》的參考意義，恐怕就未必能和摯、李二書相比。因為劉義慶是劉宋前期人，他所能選錄的作品一般只能到宋初為止，像顏延之、鮑照諸人均比劉義慶後死，其作品自難入選；即使像謝靈運、謝惠連這樣的作家，是否入選，也難可確考。因為他們和劉義慶畢竟是同時人。相對來說，孔道的《文苑》一書也許較劉義慶《集林》對蕭統更有參考意義。但孔道其人無傳，據《南齊書·王秀之傳》和《王奂附續傳》，他大抵生活於永明末至隆昌初（493 - 494），那麼其人與謝朓、江淹、沈約諸人當屬同時，以此推測《文苑》一書可能收錄了劉宋一代作家的許多作品，對《文選》的編纂確有重大幫助，但對選錄“永明體”那些作家之作時，恐怕難有裨益。然而，齊梁兩代的作品，入選《文選》者合 117 篇，約占《文選》全書所選作品的六分之一左右。根據《隋書·經籍志》著錄，蕭統當時所能參考借鑒的各體選本，大致當即此數。因為自梁迄隋，書籍的散佚甚多。但梁時所有典籍的名目，基本都見於阮孝緒《七錄》諸書中，原書雖佚，書名卷數當存，所以《隋書·經籍志》對梁有隋亡之書，均註明“梁存某書若干卷，亡”。據此看來，蕭統在纂錄《文選》時，對齊梁時代的作品，所費精力應比過去時代要多。因此在選錄天監以後逝世者之作當有未備，也完全可以理解。

當然，蕭統當時所能參考的前人選本也許還不止這些。據《隋書·經籍志》著錄，當時除了綜合各體的選本外，還有不少分體選本，這方面，似以詩、賦二類為多。例如賦體，就有：“《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撰。”梁存而隋亡的還有：“《賦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這些書蕭統可能都參考過，但所取未必很多。因為《文選》中收的賦，照蕭統原本僅十卷左右，而所選晉前名篇，大抵已見《文章流別集》、《翰林論》，而宋齊以後賦所取本少。所以這些賦的選本大約被蕭統所取者不多。蕭統所能見到的前人所編詩選，為數尤多。據《隋書·經籍志》，有“《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詩集鈔》十卷，謝靈運撰”；“《古詩

集》九卷”；“《六代詩集鈔》四卷”；“《詩英》九卷，謝靈運撰（梁十卷）”；“《今詩英》八卷”。此外，梁存而隋亡者還有“《雜詩鈔》十卷，錄一卷，謝靈運撰”；“《雜言詩鈔》五卷，謝朓撰等”。在這裏，那些謝靈運所撰的選本自然應更受蕭統重視。但謝靈運卒於宋元嘉十年（433），他編的選本，不可能包括劉宋以後之作。在這方面對蕭統較有參考價值的大約不外《古詩集》、《六代詩集鈔》和《今詩英》三書。但這三部書業已散佚，其內容已難考知。它們對選錄天監至普通年間詩人之作有無幫助，已不得而知。除了詩賦外，其他文體的選本在當時也有不少，如箴銘類有“《古今箴銘集》十四卷，張湛撰”；隋亡梁存的還有“《箴集》十六卷”。七類有“《七集》十卷，謝靈運集”；“《七林》十卷（梁十二卷，錄二卷，卞景撰）”。隋亡梁存的還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其他如“碑”、“設論”、“論”等文體亦有一些選本，但估計對蕭統編纂《文選》幫助不大。因為這些文體在《文選》中所收數量甚少，而且所收又多為歷來傳誦之名篇。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